

CAMBRIDGE

政治经济学 新方向

[美] 杰弗瑞·S. 班克斯 艾里克·A. 哈努谢克 编
王志毅 李井奎 叶敏 译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新方向

[美] 杰弗瑞·S. 班克斯 艾里克·A. 哈努谢克 编

王志毅 李井奎 叶敏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经济学新方向 / (美) 班克斯 (Banks, J. s.),
(美) 哈努谢克 (Hanushek, B. A.) 著; 王志毅, 李井奎,
叶敏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书名原文: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Old Questions,
New Answers

ISBN 978-7-208-08997-6

I. 政… II. ①班…②哈…③王…④李…⑤叶… III. 政
治经济学—研究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8295 号

责任编辑 周 运
装帧设计 张 布

政治经济学新方向

[美] 杰弗瑞·S. 班克斯 艾里克·A. 哈努谢克 编
王志毅 李井奎 叶 敏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25,000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997-6/F·1916
定 价 32.00 元

序

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单个研究者沿着他们的研究直觉来丰富我们对特定政治与经济现象的思考。至少从美国的实践来看，在当前的研究思路与传统进路(approach)大相径庭的时候，制度障碍(institutional impediments)通常会妨碍相应研究的开展。如果新方法触碰到了现存学科(discipline)的边界，这一点就变得尤为明显。 ix

本书代表了努力改变现存制度障碍的第一步。这里所收录的论文曾在罗彻斯特大学 W. 艾伦·瓦里斯政治经济学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宣讲过。瓦里斯协会是罗彻斯特大学经济学与政治科学各系努力鼓励学科间进一步密切学术联系的自然派生物。本书所勾画的研究线路是发展新的研究方法的起点。罗彻斯特大学支持与鼓励该项研究，为瓦里斯协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

瓦里斯协会的命名是为了纪念 W. 艾伦·瓦里斯。他是罗彻斯特大学的前校长，但更重要的是，他的职业生涯是现实政治经济学的个人典范。作为统计学家，他在拓展统计学方法方面获得了广泛赞誉，曾当选为美国统计协会的主席。然而他的职业生涯并不止于统计学。他从学术界转到为政府工作，同时保持着与商界和实业界的密切联系。他帮助发展了国家统计体系；他为从艾森豪威尔到布什的各位总统提供

过咨询；他曾担任经济事务方面的助理国务卿；他还曾担任全国许多企业的董事。我们以他的名字为这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协会命名不是
x 偶然的。这次成立大会在他的 80 岁生日之际召开同样并非出于偶然。

我们希望瓦里斯协会在未来出版的作品能够在现在迈出的第一步基础上越走越远。

目 录

序 / 1

导论 / 1

杰弗瑞·S.班克斯(Jeffrey S. Banks)

艾里克·A.哈努谢克(Eric A. Hanushek)

第一章 管制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展望、议程与方法 / 10

戴维·P.巴伦(David P. Baron)

第二章 管制承诺和公用事业私有化 / 64

巴勃罗·T.斯皮勒(Pablo T. Spiller)

第三章 转轨的政治经济学：自由化与产权 / 81

威廉·H.赖克(William H. Riker)

戴维·L.韦默(David L. Weimer)

第四章 政治与贸易政策 / 111

雷蒙德·里兹曼(Raymond Riezman)

约翰·D.威尔逊(John D. Wilson)

第五章 选举、政党结构和经济 / 151

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

第六章 预算赤字控制的政治学与经济学：政策问题与研究问题 / 178

爱德华·M.格拉姆利克(Edward M. Gramlich)

第七章 法律、立法与实证政治理论 / 199

约翰·费雷约翰(John Ferejohn)

第八章 社会制度的理性选择理论：合作、协调与沟通 / 223

兰德尔·L.卡尔弗特(Randall L. Calvert)

索引 / 279

导 论

杰弗瑞·S.班克斯(Jeffrey S. Banks)

艾里克·A.哈努谢克(Eric A. Hanushek)

根据本系列丛书*中较早一本的编者所解释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政治与经济诸制度背景下的理性选择研究。^[1]它的核心信念是,要对经济现象作深入理解,就要获得有关政治制度、行动者(actor),以及体现在决策过程中的激励(incentive)的知识。反过来说,只有借助经济学的理性行动者假定并对政治选择的经济后果作持续观察,才能深入地研究这些政治变量。

尽管在现代学术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学 and 经济学共存于作为单一学科的政治经济学之中,但自19世纪晚期以后,它们正式分道扬镳。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样的分裂尽管有利于特定科学的发展,但却令经济学家与政治科学家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出现了分歧。学科的分离帮助它们建立了相应的适当方法与最有效的研究路径,也对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设定了人为的束缚。重构政治经济学是为了在那些个体、制度与市场的互动至关重要的领域中将分立的观点重新统一起来。

* 这里的丛书指的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制度与选择的政治经济学”丛书。——译者注,下略

[1] J. Alt and K. Shepsle, eds.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p. 2.

经济学与政治科学被分割成相互独立的学科可以追溯到许多原因。举一个突出的例子，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重点研究个体消费者与厂商在完全竞争市场(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中的行为，而忽略了任何的政治学考量。事实上，新古典运动的奠基者之一斯坦利·杰文斯，就是在早期主张将“我们科学的陈旧麻烦的名字”，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改名为更为简洁的“经济学”的人。^[1]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到了19世纪晚期，致力于纯粹的经济学研究与政治科学研究的职业组织开始浮现，与此相伴的是分离的学术部门在各主要大学的发展。在不同的学校，基于各自的内部动态，这一发展的时机有所不同，但学科的分立^{*}在20世纪早期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

这种学科分立的最重要含义是走向更高程度的专业化。经济学家专心致志地研究市场活动，并在很大程度上将政治与制度结构视为给定。另一方面，政治科学家们则致力于研究在非市场状态(nonmarket situation)下制度如何与个体互动，以及个体如何为制度塑型。这样的专业化具有相当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在限制了研究的范围之后，许多分析变得更易于处理了。此外，由于理论发展的模式、经验分析(empirical analysis)所要求的数据，以及理解不同领域差异所要求的专家知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立推动了各自领域知识的快速发展。当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研究的分工可能遮盖了重要的问题。比如，如果市场自身通过法律与管制影响了制度结构，那么给定制度结构下的分析就带有了相当的误导性。

在学科分工被滥用得最厉害的那些领域，将政治科学与经济学重新融合成政治经济学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成果。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人们的期待也越来越高。运动的两个分离但相互关联的方向共同朝着一门新的政治经济学逼近。首先，运动提供了学科交叉的自然方法

[1] 引自 B. Clark, *Political Econom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New York: Praeger (1991), p. 32.

* division 在书中依上下文译成“分立”或“分工”。

(natural way), 并引入跨学科边界的新方法与思维。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方向并没有真的改变研究的根本界线。它只是提供了扩展和改进现有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研究边界的自然方法。政治科学家强调制度, 而且他们的工作可以帮助经济学家搞清楚经济制度的结构是如何影响经济绩效的。反过来, 经济学家的个体选择方法也已令政治科学更为严肃地反思它关于制度的形成(formation)、演化与维护的理论。毫无疑问, 这样一种跨学科的交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从企业管理到宪法设计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问题。

其次, 也是更令人兴奋的, 是两种分析方法的综合。如前面所指出的, 在许多场合中, 市场、政治与制度的概念分离(conceptual separation)是很成问题的。比如, 要分析管制的经济效果, 就不能完全不考虑市场与政治力量是如何决定制度结构的。用最简单的话说, 管制制度及其规则并不是上天所赋予的礼物。相反, 他们是由包括被管制者、管制者以及一般公众(如消费者和投票者)在内的政治身体(body politic)所设计、执行与调整的。分析企业在一整套管制下的行为, 如果不考虑制度本身的起源与发展, 可能会遗漏最为重要的问题。此外, 在假设管制结构给定的情况下, 已作的分析也许会出现严重的偏见。另一个例子是, 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与关税形成的研究一般并不考虑竞选献金(campaign contribution)和利益集团游说等政治活动; 类似的, 政治科学家们自然会把关税形成视为分配政治(distributive politics)的一个例子, 而对潜在经济力量如何促成贸易限制的分配结果缺乏认识。专业化对学院研究诚然是有利的, 但它会鼓励对社会互动问题的倾向性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统一方法有望将政府经济政策制定、产业管制、立法结构和绩效, 以及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发展或变换等问题连接起来。

重建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步通常是相当不平衡的。比如, 经济学家倾向于使用已经相当成熟的个体经济行为最大化模型, 并将之嫁接到政治学的极简模型(simplistic model)当中。政治学模型仅被当做一个能

够提供政治方案的“黑箱”来处理，而不去分析它的来龙去脉。当涉及政治行动者的时候，并不把他们的行为看成是最优化的——与经济行动者完全相反。另一方面，政治学家则倾向于将市场产出的扭曲模型(distorted model)嫁接到他们所发展的政治行为模型中。他们没有完全领略市场互动模型的精妙所在，忽略了市场对政治变迁的调协(adjustment)能力。事实上，在早期的发展中，当接受传统训练的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尝试着在对方的学刊上发表文章时，往往会遇到对他们所采用的极简模型方法的轻蔑和不屑。

最近的发展已经开始更为平衡地处理公共行为问题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学当前最具创意与潜力的领域是借助制度概念实现政治学和经
4 济学的互动。这包括两边都是理性行为者的模型，并在许多形式中将非常重要的制度结构的内生性考虑进来。本书的余下章节便聚焦于这个智识(intellectual)发展的新阶段。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会因为特定领域的变化而变化。研究金融管制最为合宜的分析结构几乎肯定和用来处理关税与配额的不同。然而，在差不多所有背景中都可以找到一个主题，那就是可以根据用于理解个人和集体行为的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来预期承诺(commitment)程度的重要性。一旦政治体系产出某个制度结构——关于合同法的要素，或者政府财政政策的制定——该体系会保持不变吗？或者它会根据个体在现有政治体系内的未来选择而变化？如果政治体系不愿或不能对未来负责(commit)，那么个体的最优选择便会与在完全负责下的选择大不相同。

政治经济学的绝大多数领域都会涉及“承诺”这个主题。制度设计(institutional design)会直接对抗这个主题。比如，在处理政府应当如何激励设备领域的私人投资者的时候，最终的效果取决于投资者是否担忧会出现产业国家化或者重新制定责任法(liability law)。这个简单的例子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主题：大规模的私人工业投资会令政治家觉得国有化很有吸引力，可是要吸引投资，政府就必须有能力作出

推行国有化的可信(credible)承诺。“设计”问题所关心的是,在政府所面临的短线激励之下,如何才能使这样的承诺变得可信。类似的,公共事业投资者面对各种针对投资收益率的管制,他们的反应也依赖于对未来的稳定收益的预期。或者,经济体中的个体储蓄行为会受到政府在未来所能够承诺的预期的影响。或者,个体投票者对政治家所作的经济政策承诺作出回应的可能性,也要依赖于投票者是否相信政治家会信守其诺言。

政治承诺概念的实际应用也会因为研究主题的变化而变化。政府借助国际组织和协议来实现所承诺的贸易政策所用的方法,显然不同于政府为实现财政政策与税收方面的承诺所采取的手段。不过,绝大多 5 数在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边界上所做的研究中,承诺是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它同时也构成了以下各章间的共同主题。

在本书中,我们试着勾勒政治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本书并不打算仅仅对过去已经做出的研究进行评论,它还要提出一系列极具发展潜力的研究路线,这些研究路线很有可能深化我们对根本的政治与经济行为的理解。本书所选择的主题范围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全面。我们用共同的特性来限定分析领域。它们直接对大范围个体的福利造成影响,因而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在过去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仍遗留着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这些领域中,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的互嬉(interplay)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不同的章节在对政治或经济后果的主要关注上,在不同类型的经济行为人(个人、企业,或国家)的重要性上,以及在最为核心的政治活动类型上又存在着分歧。本书所选之外的其他例子也可被收录或进行替代。但是我们做当前选择的重要原因是它们代表了现代政治经济学领域主要的分析和建模(modeling)方法。

在第一章,戴维·巴伦(David Baron)综述了针对企业和产业的政府管制。该领域的一类重要工作是研究在不对称信息下对垄断行业(如公共事业)的管制,不对称信息在这里有助于确定管制者的最优决策。早期的模型将管制者设定为追求经济效益,并能够对长期产出与定价安

排负责。近来的研究同时放松了这些假设，允许管制者的决策计算中加入分配性的和其他的考虑，允许管制者、被管制企业和他们的政治监督人之间进行议价(bargaining)，还允许模型的某部分参与人或所有相关部分不做承诺。文章也涉及了其他研究方向，如结合了芝加哥学派更强调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能力而非推进效率能力思路的管制模型。巴伦综合了管制的各方面特征，流畅地陈述了现有的结论和开放性的问题。

第二章也分析管制。巴勃罗·斯皮勒(Pablo Spiller)分析了各个拉
6 美国家将公共事业私有化的尝试。他发现，和巴伦在第一章中的讨论一致，执行有效的管制安排非常依赖于政府承诺提供“公平”收益率的能力。这样，欠缺宪政这类能对抗政府征用的保护手段的国家，往往在私有化方面有沉痛不堪的经验。相反的，那些拥有保护手段的国家有能力进行私有化，这非常生动地展现了政治制度的经济后果。

威廉·赖克(William Riker)和戴维·韦默(David Weimer)在第三章研究了新兴民主化东欧国家的政治承诺问题。他们特别分析了不同国家在尝试建立一个保护产权的制度方面的努力如何决定了它们的社会转型是否成功。潜藏在任何新古典交换与生产模型以及相应的均衡分配的有效性背后的，是假定存在定义良好的拥有和控制资源的权利。因此，在东欧原有的制度崩溃之后，只有对“谁拥有什么”这个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才可能出现好的自由市场制度。而且，这个问题还很自然地引出了分配问题，因为所有权的确立必然也同时明确了相应的利益分配。东欧的困难在于，在一个以民主理念为基础的发展中政治体制之下，它们建立产权制度的同时又试图去影响该制度下的短期赢家与输家。和第一章与第二章研究管制时一样，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政府承诺维持产权制度以及为这个制度提供足够政治支持的能力，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在第四章，雷蒙德·里兹曼(Raymond Riezman)和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分析了私人企业影响所在国贸易政策的能力。亚当·斯密以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支持国家间实行没有关税、配额的自由贸易。

可是这些贸易障碍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而且它们似乎系统地存在于不同行业与国家之中。当人们把政府在许多新古典模型中的“仁慈的计划者”形象替换为敏感地根据重要的选民代表团体的需求作出政治决定时，理论与数据的不一致性便消除了。特别是，从国内的单一企业或行业的视角来看，贸易保护制度带来的利益是相当大的，尽管它会降低效率。因此企业愿意向政治进程(political process)投入时间、努力和金钱，以确保这类利益。本章主要研究在政党和候选人将争夺选票作为确定政策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影响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环境(political environment)。

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在第五章研究了政治制度对宏观经济变量如通货膨胀、失业的影响。和前一章对贸易理论的研究一样，本章的中心观念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并不仅仅是由效率(或其他因素)决定的，而更可能是达成对政策的一致(consensus)意见的政治进程的结果。多数宏观经济学的政治模型都将这个进程简化为假定一个单一的代表人(如总统)可以全权制定政策，然后研究政治竞争或政党意识形态对政策结果(policy outcome)的影响。比如，“机会主义”模型认为当在位代表人打算最大化其重新当选的可能性时，他会对政策进行调整；在这样的模型中，我们应当会在代表人在职期内观察到“政治商业周期”(如，在选举前出现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党派”模型则假定不同的党派由于对特定政策成果的内在偏好，会遵循不同的政策路线；在这里，周期的运动跟当权的政党相关。阿莱西纳对两种模型的理论 with 数据支持(或阙如)，以及它们的“理性预期”继承者作了评论。

爱德华·格拉姆利克(Edward Gramlich)在第六章分析了财政政策与赤字控制的政治学 and 经济学。他特别根据过去试图通过立法活动，如1985年的《格兰姆—罗德曼—哈林斯法》控制政府不受约束的赤字财政的措施，来研究美国联邦平衡预算修正案的利弊。政治家被引诱花明天的钱为今天造福：等到要支付今天的账单的时候，当时的政治家已经下台了。(事实上，相关的问题并不是今天的赤字额为什么如此之

大,而是为什么它并不是一直都这么大。)格兰姆—罗德曼为连续的预算设定目标水平,在“强制扣押”(sequester*)的惩罚威胁之下,理论上这样的预算目标一定能实现。但是,和前面的章节一样,这里就出现了承诺问题:没有一个国会能绑住另一个国会的手脚,所以当预算成了束缚的时候,当前的国会就会对它作出修改。那么,联邦平衡预算修正案的作用就是通过增加改变目标所需的执行成本来限制改变。格拉姆利克提出该论证思路的说服力,有部分是鉴于在州这一层面上,50个州中有49个要求平衡预算。

在绝大多数章节中,涉及决策制定的政治制度或是包含在立法部门之中,或是包含在行政部门之中。比如,第五章的宏观经济模型或第四章的贸易模型中的选举人选择的单一代表,大致可以被看成是总统。不过第六章的平衡预算讨论首先做的是立法决策。在第七章,约翰·费雷约翰(John Ferejohn)将政治学的上述及其他理性选择模型扩张至司法部门。法庭对立法和执行政策有着清楚而可测度的影响,且结果是无可争辩的;对法律条例的司法评论以及用行政法治理执行机构对此提供了担保。这些新兴的法庭理性选择模型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立法与执行模型的许多基本工具(偏好、策划、议程控制等等)用到了对法庭的分析中去,从而以一种精简(parsimonious)的方式扩展了早期模型的制度范围。这种创新也用在了其他地方:通过思考诸如法律的解释、古典的法律主题与争论等问题,赋予陈旧的立法政策选择模型以新的生命。

最后,在第八章,兰德尔·卡尔弗特(Randall Calvert)从前几章应用导向的研究中退后一步,更一般地将政治和经济制度解释为内生决定的现象。这里的关键洞识(insight)是,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制度都有潜在的实施问题;他们必须有一些方法以使决策的规则和过程能够有力约束个人与集体行为。举一个第六章的例子,通过一个联邦平衡预

* 原文为 sequestor, 疑有误。

算修正案并不会自动产生平衡的预算,因为没有机制能够阻止相关的政治行动者(包括司法系统里的人)不理睬这个修正案。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会影响未来的政府决策的政党(见第二章的讨论)来说,这种办法的代价也许是非常昂贵的。因此并不是修正案自身,而是政治行动者用以回应当前激励的行为,产生了平衡的预算。那么,有效的制度拥有能够自我执行的特征,因为参与者有激励维持这个制度。而这个自我执行的标准不可避免地导向以博弈论的建模策略来理解制度的兴起与稳定。卡尔弗特用集体行为或协调博弈(coordination game)的均衡结果⁹来模拟经济与政治制度,并阐述了在这样的博弈中,沟通(communication)是如何培育出合作的结果。

书中的每一章都略去了一些在数十年的学术发展中脱颖而出的政治与经济分析结构。每一章都指向了传统的专业化学科为什么无力处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社会主题。构成学科的刚性边界限制了分析的范围,并且过于频繁地在那些重要主题上误导了结论。

不过,这些文章对新的研究路线作了最好的思考。每一章都描述了相关领域当前的知识和研究状态,批评了欠缺之处,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当然这些思考也存在不确定与不成熟的地方。

在许多方面,本书的成功是根据它以多快的速度过时来衡量的。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成功发展会脱离现在的起步阶段,把我们带到目前未知的方向中去。尽管并非所有作者都这样想,我们还是想让“过时”来得更快些,因为这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迹象,显示出政治经济学的重新兴起并改变了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

第一章

管制的经济学与政治学： 展望、议程与方法^[1]

戴维·P. 巴伦 (David P. Baron)

导 论

10 本文综述了对管制的研究的不同方向，确定了一个关于研究主题的议程，并讨论了某些主题的研究方法。我们的分析集中于一系列社会科学研究可能作出贡献的主题，而没有考虑这些主题如何与现有的分析工具相容。因此本文更多关心研究机会 (research opportunity)，而较少关注整个过程最终会走向哪里。其中许多研究机会是由管制实践与新思路 (emerging concern) 所带出的。

有一种管制研究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在辨别市场失灵以及纠正这类失灵的类市场 (market-like) 机制上。这个方向必然是规范性的，且按照效率的标准来测度绩效。管制理论的主要进展来源于将管制关系中的

[1] 这项研究受到 NSF Grant No. SES-9109707 的支持。我要感谢 Justin Adams, Susanne Lohmann, Pablo Spiller 和 Robert Wilson 的有益评论。

行为内生化。不仅是将企业行为内生化，还要将管制政策的选择内生化。不过，该研究不仅要提供关于有效管制政策的建议，还要预测并解释实际的管制行为。

第二种管制研究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走的是实证方向。就最简单的形式来说，政治经济学方法将管制看成是影响政策变换所带来分配结果的利益函数的需求与供给。^[1]这样，政治经济学方法并没有要求市场失灵为提供管制的必要条件。然而，由于存在市场失灵而且纠正它的政策产生了分配结果，该方向并没有与市场失灵完全脱离。这些分配结果同时为支持和反对该政策的政治行为提供了激励，但如果政策并不是帕累托占优的，且无法进行补偿性支付(side payment)，就不存在针对利益冲突的简单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将取决于政治制度。

政治经济学方法并非与规范理论不相容，因为规范理论要结合一直伴随着政策选择与执行的政治行为。在经济学里，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被纳入到管制政策的设计当中。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我们应当根据现存的政治活动以及可能的在熟悉了该政策的相关信息之后意图改变政策的机会主义政治行为来设计管制政策。“管制政策的政治设计”一节对该问题有更全面的阐述。

在过去的25年，对经济或产业、管制的研究出现了爆炸性增长。这是由许多力量所推动的。其中之一是管制绩效(regulatory performance)，即对诸如航空公司、货车运输和公共事业等行业的成本进行管制的效果。这类研究不仅关注竞争是否能比管制具有更高的绩效，还研究管制过程本身是如何影响绩效的。尽管在许多行业中解除管制已经大行其道，且在其他行业中管制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弱，但行业绩效的分配结果所派生的政治力量仍有可能推动价格管制卷土重来。近来在基础有线电视服务中已经推行了价格管制，且可能推广到处方制药业。快速增长的卫生保健支出所产生的压力，有可能导致在卫生保健产品与

[1] 见 Stigler (1971) 和 Peltzman (1976) 提供的早期例子。